

《曾侯乙编钟》邮票和特别的唱片

刘建辉

1987年12月10日,志号为T.122M的特种邮票小型张《曾侯乙编钟》发行,此小型张票面主图为曾侯乙编钟,发行量较少、供不应求,迅速成为国内外集邮爱好者收藏的珍宝。

曾侯乙编钟特种邮票小型张

1977年9月,一支部队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平壤山头、兴建厂房,不曾想挖到了一座距今2400年前的大墓。这座大墓中出土的一件乐器,不仅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

这件超大型的乐器就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名为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乐器,编钟架长达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65件,分3层8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锥、浮雕、阴刻、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

曾侯乙编钟音乐性能良好,音域宽广,音调准确,音色优美,具有“一钟双音”的特点,即一个钟能够演奏两种不同的乐音。除了“一钟双音”,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并且具有12个半音,这跟西方12平均律是一个概念。钢琴有七个八度,曾侯乙编钟有五个半八度,音律很宽广。曾侯乙编钟是至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乐器之一,有关部门曾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进行调音,结果表明战国时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律音乐体系,打破了过去认为十二律是古希腊传来的说法,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它也是中国迄今保存最完好、音律最齐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一件国宝,中国的邮票选题哪能错过呢?《曾侯乙编钟》邮票的选题就落在了那柏林身上。为此,那柏林数次南下,考察编钟,为小型张邮票的设计做准备。就在此期间,那柏林突发奇想,这个国宝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还能不能演奏?声音怎么样?演奏出来是什么效果?这一定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这个可能,把这个编钟演奏一下,用录音机记录下来,再制成唱片,让更多的人能听到2400年前的编钟音乐,并且把它流传下来,那多棒呀!这个想法能实现吗?首先,这件国宝是在博物馆里靠墙放着,外面还有玻璃罩罩着,根本无法演奏。就是为邮票设计拍张照片都难。这件国宝能从博物馆拿出来吗?要放在哪儿才能安全,又不影响演奏编钟的效果呢?这是其一。其二呢,录音机是关键设备。必须有最先进的录音设备才行,可是改革开放初期,哪能找到这样的录音机呢?其三,那柏林要做成成的唱片,不是直径为25或30厘米的黑胶唱片,而是能与邮票小型张同时放在一个邮折里的超小型唱片,当然也不能太厚。这个苛刻的要求有哪个厂家能



《曾侯乙编钟》邮票和特别的唱片

实现呢?这一连串的难题,放在谁身上,都会冒出3个字:不可能!

年过九旬的他,面对镜头这样形容他的性格:我这个人办事特别执着,就是一根筋!只要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柏林非要挑战一下3个“不可能”!

第一个挑战“不可能”的就是要把编钟搬出来,放到合适的地点,既能拍照,也能演奏。可能吗?这件事让湖北邮电管理局的同志犯难了,他们找到省博物馆,博物馆拒绝了:我们决定不了,你们请示省里吧。

那柏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湖北邮电管理局向省里打报告,请示在拍摄编钟照片设计邮票的同时,演奏编钟事宜。报告打上去,却迟迟没有回音。您想,这件堪称国宝的重器,要把它从博物馆移出来,还要演奏。其中所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得掂量掂量。放置场地、安全问题、运输问题、保管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做到慎之又慎、万无一失才行啊!

半年过去了。就在那柏林焦虑万分时,终于有消息了,出邮票是大事,特批;同意。半年的等待,让那柏林心中的第一个难题终于破解了。这套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编钟共有65件,总重量达2500公斤。最大的(下层右数第一件)高152.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上层右数第七件)高20.4厘米,重2.4公斤。这么一套家伙放在哪里才更安全,也不影响演奏呢?最后,选择在武汉东湖边上一个部队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个舞台。半夜里,从博物馆运出来,一个排的警卫负责编钟运输的警卫工作。这套编钟就安置在大操场的舞台上。那柏林就开始拍照,为邮票设计做资料准备。

特别的唱片

挑战第二个“不可能”,就要把编钟的珍贵声音记录下来,没有好的录音机不行。上世纪80年代没有找到好的录音设备,简直太难了。那柏林一位好朋友的电话,让他踏实了。这个北京广播电台的朋友,叫赵维端,是一位专业录音师。原来,北京广播电台刚从国外引进了一台先进的录音设备了,但录音必须要到武汉。北京广播电台的赵维端能去武汉

吗?电台刚刚引进的录音机能放行吗?那柏林心里直打鼓。赵维端要是去不了,这台戏就砸了。令那柏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维端轻松地回答:我跟你去。

晚上,武汉车水马龙的街道终于安静下来。警卫排按照部署已各就各位。赵维端的录音机也摆好了,湖北省歌舞团的演奏员也已到场。那柏林盼望已久的编钟演奏真的就要开始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片嘈杂声音从远处飘过来,一听,原来是东湖里的“住家”——蛤蟆上班了,一切准备停当的大戏,在蛤蟆的捣乱下,只好停下来。

凌晨2点以后,嘈杂声音逐渐安静下来。编钟的演奏这才正式开始。64件古乐器,在几位专业演奏家的演绎下,浑厚的古编钟声音搭载着古曲《竹枝词》,在整个大操场里回荡,在东湖边上回荡,在武汉的上空回荡,余音久久……

赵维端携带的录音设备完整、忠实地记录下了编钟演奏的古曲《竹枝词》。有了录下编钟奏出的完整的音乐,那柏林要挑战第三个“不可能”。北京唱片厂离得近,那柏林亲自去厂里联系,想制作小规格的薄唱片。没想到北京唱片厂一口回绝:做不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那柏林为此着急上火之时,赵维端给他解了围。原来赵维端在上海有一个朋友,就在上海唱片厂工作,名叫李维铨,是位工程师。赵维端说:我联系联系他,看能不能帮忙。

赵维端电话打过去,李维铨欣然回答,行,你们带着东西来吧,我给你们解决。简直又是天意呀!那柏林和赵维端兴奋地随即赶到上海。李维铨直接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很小的工作室,60多平方米,里面有一台机器。赵维端把录制有《竹枝词》的编钟录音交给李维铨。李维铨二话不说,埋头就在刻录机上干起来。

李维铨对那柏林和赵维端说,你们也不用等了。我把它刻录下来,做成小唱片,还需要一些日子。你们就在北京等等吧。到时给你们打电话,过来取就行。

在李维铨的精心制作下,一批红色的、薄如蝉翼的小唱片终于通过一枚枚小邮折到达广大集邮者的手里。

在改革开放初期,尚没见过这种精致的迷你小唱片的集邮者,无不对唱片与邮票的组合啧啧称奇,也对那柏林先生在集邮品上的创新表示钦佩!

为了保护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国家明确规定,只把它作为文物供观赏,不再允许任何人、任何理由去敲击或演奏。为此,湖北专门仿制了一套编钟,用以演奏之用,除了那柏林小唱片上刻录的编钟音乐,其他所能听到的编钟音乐都是仿制品发出的声音。那柏林的创新制作,在小唱片上刻下的编钟声音,将成为历史上唯一由编钟留下的珍贵声音,这段编钟音乐也将成为永远的绝唱!

令人唏嘘的是,成就编钟音乐小唱片的赵维端和李维铨帮助那柏林成功地挑战了三个“不可能”后,已先后去世。

这套邮票发行以后,集邮界曾经引起不小的波澜。有不少集邮爱好者提出疑问,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发行的邮票都带背胶,为什么《曾侯乙编钟》邮票没有背胶?而且也不打齿孔?这在新中国邮票发行的近40年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不带背胶,不打齿孔,这套邮票不俨然成了一张画片吗?那么当时什么原因才导致邮票上缺少这两个重要元素呢?

对这个集邮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吧。恐怕也只有那柏林先生能解开这个谜!当我的问话一出,那柏林长长叹了口气。

为什么那柏林有如此的感叹呢?原来,那柏林把《曾侯乙编钟》小型张设计好以后,确定用雕刻版,这也是那柏林最中意的邮票印刷方式。邮票请谁来雕刻呢?孙鸿年,这是邮票厂非常著名的邮票雕刻师。钢版雕好后,那柏林非常满意。但邮票厂表示这套邮票安排不了,就请541厂(人民银行印刷厂)印吧。

541厂是专门印制钞票的,有雕刻印刷设备。但由于北京邮票厂的纸张都是根据印刷邮票的设备定制的,而541厂是印制钞票的,北京邮票厂的纸张无法在541厂的设备上使用。所以只能用其他纸张替代,这也造成了《曾侯乙编钟》邮票无背胶的尴尬。不仅如此,541厂不是邮票的专门印制厂家,也没有邮票的打孔设备。所以《曾侯乙编钟》邮票既没有背胶,也没有打齿孔。成为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的一个特例。

(作者系国家邮政局邮票品管理司原司长)

清代中期,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活跃着一个以革新面貌立足于画坛的职业画家群体,这就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他们借画作来抒发胸怀,比拟人品之清高,个性之鲜明,思想深刻,情感炽热,形式上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创作了大量的隶、魏楷,创造出一种风格独特的“漆书”,清晚期画家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称之为“苍古奇逸,魄力沈雄”,在当时的书画界声望极高。

武汉博物馆藏有一幅金农的《墨梅图》轴,纵97厘米,横41.5厘米。绢本,墨笔。画面选取梅树局部,几欲被分岔的梅枝自右至左斜伸而上撑满,梅树根部隐于画左侧及画底。梅枝婀娜多姿,自然伸展,上部细枝仿佛不胜寒风凛冽,弯曲向后,却依然劲健生动,富有张力。一朵朵梅花缀在枝上,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恣意怒放,将梅花不惧严寒的韧性体现出来,充满了无限生机。全幅布局合理,上部以梅枝的弯曲回环留出一片白,使画面富于空间感。梅枝、梅花虽然繁密,但毫不滞塞杂乱,枝干交错清晰可辨,具有金农画梅特有的繁花密枝式风格,展现出一片盎然诗意的墨梅意境。画幅右上,作者以隶书题跋明确道出此画创作的时间:“乾隆二十年二月七日画。”下钤白文“金吉金印”方印。这种开宗明义道出绘画时间的方式在我国绘画史上并不多见。画幅左侧有自上而下分3行小字隶书题识:“近得南唐小观,试杜氏墨,为梅兄写照。梅兄骨相清古,与淇水之上竹弟同一瘦也。吾邑处士林先生颇能此诗,当乞其冷句以赠梅兄。稽留山民金农漫记。”下钤朱文“金氏寿门”方印。右下方另有鉴藏印3方,分别为“汉阳怀清斋张仁芬季都父鉴藏金石书画之章”朱文长方印、“季都癸亥岁以前所得”朱文方印、“季都审定”白文方印。

根据鉴藏印文,可知此画曾为张仁芬所收藏。张仁芬(1868—1935),字季都,号桂芬,晚号直庐退叟,湖北汉阳人。曾任职于安丰盐场,为官清廉,深得民心,离任时留下“留靴”佳话。张仁芬一生喜爱收藏字画、图书、碑帖及其他古玩,取“传家敦孝友,望古怀清芬”之意,命名居所为“怀清斋”。张氏是一位近代鉴藏大家,经他手鉴定收藏的古代字画、碑帖甚多,主要有王原祁的《仿大痴富春山图》、何绍基临《西狹颂》,汤貽汾、董婉贞夫妇立轴等。

这幅画布局繁而不乱,疏而不散。笔法细腻精到,以淡墨画树,浓墨画梅枝、点苔,以拙朴线条圈花,浓墨点蕊,浓淡墨色交融,明暗虚实相生,并将自己的金石笔意掺杂其中,形成质朴、荒寒、苍老、清奇的自然境界。《桐阴论画》称其“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习

气”,以此画而论,足以当之。金农偏爱梅花清雅飘逸的风度,高洁、坚强的品格,曾画梅并题诗曰:“砚水生冰墨半干,画梅须花晚来寒。树无丑态香沾袖,不爱花人莫与看。”他的墨梅师法南宋画梅名家白玉蟾,一生画梅无数,自称“江路野梅”,在这幅画上,金农以“梅兄”称谓梅花,可见其对梅的挚爱之情,所画墨梅主干道劲,疏枝劲节,千花万蕊错落杂,层层叠叠虚实,章法自具,营造出一派“天大寒时香千里”的意境。

清雍正、乾隆年间,“扬州八怪”突破帖学藩篱,力图革新,另辟天地,闯出新路,其中以金农和郑燮最具代表性,都有狂怪古拙之趣。康有为曾评价说:“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金农字寿门,号冬心)、板桥(郑燮字克柔,号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郑燮自创“六分半书”,有“乱石铺街”之喻;金农自创“漆书”,字体“以拙为妍,以重为巧”,也就是将毛笔尖锋剪去,书写时铺平如扁刷,风格甚奇,惊世骇俗。观这幅《墨梅图》上题跋自识,用笔方正古拙,结体敦厚宽博,棱角分明,点画浓重,结构紧凑,线条粗细均匀,体势欹侧,劲健有力,体现了金农“漆书”怪拙奇特的书风,堪为画中一景。

金农博学多才,工诗文,精于雕刻、鉴定,书画俱佳,兼善山水、人物、花鸟,尤工墨梅;书法融合汉隶、魏楷,创造出一种风格独特的“漆书”,清晚期画家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称之为“苍古奇逸,魄力沈雄”,在当时的书画界声望极高。武汉博物馆藏有一幅金农的《墨梅图》轴,纵97厘米,横41.5厘米。绢本,墨笔。画面选取梅树局部,几欲被分岔的梅枝自右至左斜伸而上撑满,梅树根部隐于画左侧及画底。梅枝婀娜多姿,自然伸展,上部细枝仿佛不胜寒风凛冽,弯曲向后,却依然劲健生动,富有张力。一朵朵梅花缀在枝上,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恣意怒放,将梅花不惧严寒的韧性体现出来,充满了无限生机。全幅布局合理,上部以梅枝的弯曲回环留出一片白,使画面富于空间感。梅枝、梅花虽然繁密,但毫不滞塞杂乱,枝干交错清晰可辨,具有金农画梅特有的繁花密枝式风格,展现出一片盎然诗意的墨梅意境。画幅右上,作者以隶书题跋明确道出此画创作的时间:“乾隆二十年二月七日画。”下钤白文“金吉金印”方印。这种开宗明义道出绘画时间的方式在我国绘画史上并不多见。画幅左侧有自上而下分3行小字隶书题识:“近得南唐小观,试杜氏墨,为梅兄写照。梅兄骨相清古,与淇水之上竹弟同一瘦也。吾邑处士林先生颇能此诗,当乞其冷句以赠梅兄。稽留山民金农漫记。”下钤朱文“金氏寿门”方印。右下方另有鉴藏印3方,分别为“汉阳怀清斋张仁芬季都父鉴藏金石书画之章”朱文长方印、“季都癸亥岁以前所得”朱文方印、“季都审定”白文方印。

(作者单位为武汉博物馆《武汉文博》编辑部)



清 金农《墨梅图》轴 武汉博物馆藏



黑漆描金双龙纹药柜



黑漆描金双龙纹药柜

医药文物是故宫博物院一个富有特色的收藏门类,也是宫廷医事活动的重要实物遗存。在故宫博物院近期举办的“诚信仁术——清宫医药文物展”中,既有道地的中药药材,又有精心炮制的中成药,还有来自异域的外国药物,以及种类多样的医疗保健器具和各种名目的档案簿册。通过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代医疗的历史状况,也可以窥见宫廷生活之一斑。在此次展览中,黑漆描金双龙纹

药柜外部以龙纹装饰为主,通体黑漆描金,柜门内侧描绘花卉图案。此药柜可以盛放药品达140种,柜面上有涂金名签,标明每种药物名称。此黑漆描金双龙纹药柜对开柜门,柜门下接3个明抽屉。柜内为抽屉架,中心为八方转动式抽屉,上下安架,每面10个,两侧又各有一列10个抽屉。每个抽屉内分3格,盛放不同药物。据了解,本药柜背面有泥金填刻楷书“大明万历年造”6字款。

国博举办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

本报讯(记者 付裕)2021年12月28日,“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11展厅对公众展出,展出文物240余件(套),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面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真实刻画古代劳动人民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是国家博物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贴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文化展览。此次展览共分为“食自八方”“茶韵酒香”“琳琅美器”“鼎中之变”“礼始饮食”5个单元,展出精选文物200余件(套),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面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真实刻画古代劳动人民充满



彩陶豆 新石器时代 1956年出土于甘肃

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深刻表达中华民族对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其中,“食自八方”部分分为“膳食之主”“六畜三牲”和“蔬鲜果

芳”三组,展示粮食、肉食、蔬果的起源传播、培育繁殖、仓储畜养。“茶韵酒香”部分分为“天之美禄”“茗香缭绕”两组,主要展现酒与茶的诞生、加工制作、饮用、衍生文化。而在“琳琅美器”部分分为“陶之古朴”“青铜威仪”“漆木华美”“瓷之风韵”“金玉典雅”5组,由不同材质的饮食器具出发,展示其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的重要性。此外,“鼎中之变”部分由“烹饪有术”“食单著述”“食以体政”3组构成。展现食材的加工制作、菜肴的烹调及饮食相关著作文献、所延展出文化思想。而“礼始饮食”部分由“饮食礼器”“进食之礼”“宴饮之礼”3组入手,介绍展示“食”与“礼”的关系,阐释饮食礼仪的形成及对中华文

化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绵长而厚重,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不仅包含了造型精美的饮食器具、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以及浩如烟海的典籍制度,还由此孕育衍化出一系列影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哲学观念、政治智慧和科学思想,同时也为传统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诗歌等诸多文艺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

正因如此,本次展览设置有多项互动项目,展陈形式丰富。通过好看的、好玩的、能体验的、能动手感知的内容与展览形式,拉近博物馆与大众的距离,引导广大观众感受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知贯通古今的生活趣味。

据了解,此次展览是继“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览后,国家博物馆植根人民生活,从“衣食住行”延展挖掘的集普及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展览实践,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在线展示展览中的部分精彩内容,让更多的线上“观众”领略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